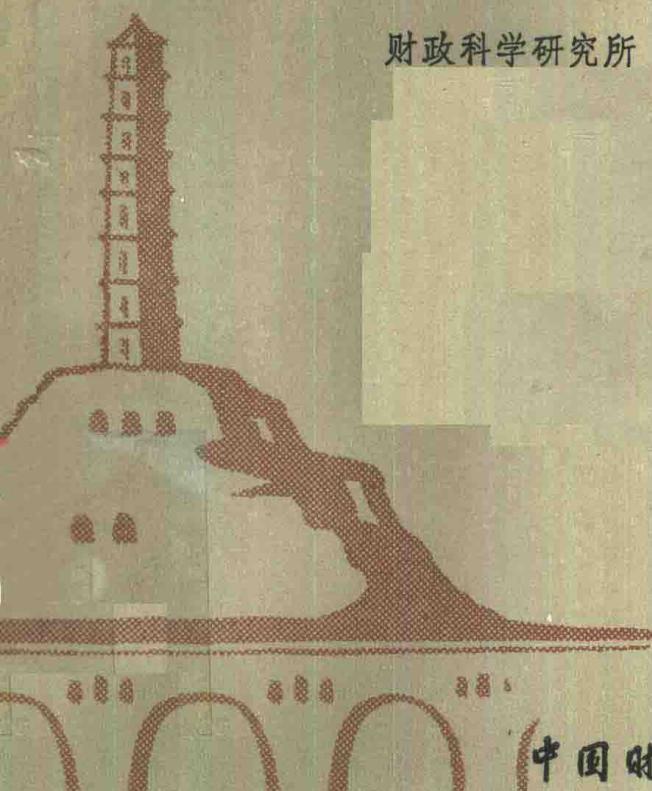


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

财政科学研究所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GEMING GENJUDI DE CAIZHENG JINGJI

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

财政科学研究所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

财政科学研究所编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07,450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1—
统一书号：4166·567 定价：2.00元**

编 者 的 话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九二七年八一起义起，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在这个时期内，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了敌后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民主政府，以极大的毅力进行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创造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重要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正确地阐述了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实践证明，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于改变根据地内部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我国各地凡是曾经建立过革命根据地的地区，近几年来，都在编写革命斗争史的同时，搜集和整理了革命战争时期的财政经济史料，并着手编写各根据地的财经史。为了交流各地的工作经验和开展根据地财经史

的学术讨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曾于一九八三年四月，在河北省唐山市召开了革命根据地财经史学术交流会。会上收到了不少论文，对各根据地的财经工作进行了探讨。本书从中选录了二十七篇，供财经工作战线和史学工作者参考。

在这次革命根据地财经史学术交流会上，有部分同志提交的论文，不属于根据地财经史探讨的范围，本书均未选用，在此谨表歉意！

目 录

-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的创建和发展 星光 冯田夫 (1)
- 关于鄂豫皖苏区的财政 王礼琦 (15)
-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问题 申有之 梁瑞兰 (32)
- 大力开源节流 保障革命战争供给 刘必成 田丁 (54)
- 闽西革命根据地财政的几个特点 陈逸超 (70)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 唐滔默 (84)
-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财政 王宗杰 (108)
- 略论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的财政建设 张洪祥 (125)
- 抗战时期晋绥根据地是怎样解决财政问题的
..... 景占魁 李树董 (136)
-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工作略述
..... 浙东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147)
- 淮南抗日根据地财政的建立与制度改革
..... 黄安 刘鸿业 (171)
- 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 唐滔默 (191)
- 东北根据地的财政 罗会文 (205)
-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农业税 于德昶 (221)
- 晋察冀边区的合理负担与统一累进税
..... 郭增寿 李士芳 (236)

- 皖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票证及其作用 应兆麟 (250)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财经斗争 刘仁荣 (258)
川陕根据地财政经济概述 杜 中 (292)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概述 李祥瑞 (321)
鄂豫边区的财政经济 刘跃光 (335)
论述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
策 王永毅 (362)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工作发展
的几个阶段 傅尚文 (384)
豫皖苏人民支援淮海战役的巨大功绩永
垂青史 河南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编写组河南医学院小组 (392)
从淮北财经工作的发展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的威力 朱超南 (401)
华中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流通和货币斗争 吴善麟 (423)
发轫在冀南 流通全华北 王静然 (440)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货币战 张励声 (460)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的创建和发展

星光 冯田夫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走上了第一个新阶段。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八月七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将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开始在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中央根据地，就是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一九三一年以后，至长征开始前，它又是中共临时中央局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所在地。在我国的土地革命中，它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根据地和财政

根据地创建以后，以根据地为依托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必

须建立革命的财政保障供给才能进行。由红军的主力和赣南、闽西工农武装创建的中央根据地，为了保证红军的供给，从一开始，就在工农民主政府内建立了相适应的财政机构。财政是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的政权决定着财政的性质，而财政又积极的影响着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根据地财政的性质和特点；同时，它又始终为实现土地革命这个伟大任务而斗争。

在土地革命时期，各地工农武装暴动以后，建立什么样的财政来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此以前党召开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就对我国的财政改革问题作过许多重要决定，如：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肃清军阀，没收其财产，以办公益的生产事业。划一币制，禁止辅币之滥发及外币之流通，财政公开。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农的生活。党提出的这些有关财政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当时，是为了号召和动员群众推翻反动政府，是作为党的斗争纲领而提出来的，对于根据地的财政建设同样也具有指导意义。南昌起义后，在起义部队向潮汕进军的途中，就为此问题进行过讨论。当时一种意见主张用摊派的办法解决经费来源，另一种意见则主张用打土豪筹款的办法来解决，后来这两种办法都曾采用过。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为了解决战时需要，也曾采用打土豪筹款和摊派的办法，解决当时财政所面临的困难。在这个时期，由于尚未

建立起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政权，财政工作还多由红军部队兼办。

一九二八年，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各根据地创建工农民主政府的经验，在《苏维埃政权组织的决议案》里，对根据地的财政问题指出：为更普遍地提高苏维埃委员会的效率起见，应设置财政部，主管税务、没收及处置财产。中央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就是由工农民主政府财政部具体组织进行的。它对于保证红军的供给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 采取多种形式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

任何一种财政制度的建立，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土地革命是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央根据地的财政，就是为了实现这个革命任务而创建起来的，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不断充实它的内容。

中央根据地在初创时期，赣南和闽西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府在武装暴动以后，都先后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但由于革命的税收制度还不能立即建立起来，因此当时主要是通过打土豪筹款、摊派和捐款的办法来解决财政的需要。在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政权，并进行了分田的地区，土地税则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辅之以其他

收入。在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除了税收外，还采取了群众性的财政动员——发行公债、借谷、捐献和其他措施，来克服当时财政所面临的困难。在财政收入上采取的这些办法，虽在各个时期有先后和主次之分，但常常是兼用并存的。

在初期，筹款的主要对象是地主豪绅，除没收其财产、田地、房屋、机具外，还可以罚款。就是用强制的手段，对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等反动派的财产实行剥夺，来解决财政的需要。采取这种办法，曾经是新发展区域筹措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是因为，中央根据地在经济上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他们占有农村土地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广大农民处在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在根据地广大农民尚未分得田地的时候，采取打土豪筹款的办法，来解决根据地财政的需要是必要的。它可以比较及时地解决根据地战时急需，同时又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这种办法首先是南昌起义部队向潮汕进军途中，在汀州城依靠商会摊派款失败以后而采取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井冈山根据地采取了打土豪筹款的办法，成为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当时“红军给养，米暂可以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①他在总结打茶陵的经验时，把“打土豪筹款”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在此以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前，打土豪筹款一直是中央根据地主力红军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来源。中央工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0页。

农民主政府成立以后，曾一度停止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但激烈的反“围剿”战争中财政所面临的困难无法解决，不久，又恢复了这种办法。一直到后来红军长征中，仍继续采取了这种筹款办法。

实践证明，打土豪筹款在根据地创建初期，对于保证红军的供给，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办法弊端很多，特别是对于那些红军新占领的城市，由于情况比较复杂，谁是土豪一时不易摸清楚，容易发生扩大化。一九三二年红军攻占漳州以后，就出现过这些毛病。开始，红军看见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作土豪，大都打错了。毛泽东同志发现这个错误后，就向抓错了的人赔礼道歉，请吃了饭，然后放了。虽然如此，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其次，打土豪筹款多是在游击区进行，这些地方是敌我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一旦发生错打土豪的情况，容易造成赤白区域的对立，这对于扩大根据地是很不利的。再次，打土豪筹款很容易被坏人所利用，造成不良影响。第四，打土豪筹款只能是一次性的筹款，不能多次去进行，而某些地区曾发生多次打土豪的情况，造成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把一些富农甚至一些比较富裕的中农也打成了土豪。这些做法都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应该很好总结这方面的教训。

摊派和捐款，也是根据地初创时期筹措经费的一个方式。其主要对象是城镇工商业。摊派是根据地创建初期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后，为解决根据地财政困难而采取

的应急措施。由于大工商业主把持商会，摊派常常把负担加到中小工商业户身上，后来就改为捐款办法。捐款和摊派不同，既向城市资本家筹集，也向富农筹集。捐款是根据资本家和富农的经济状况，分派他们一定的捐款任务，动员他们交纳。捐款也是临时性的，不能多次进行。

后来，在捐款的问题上，中央根据地曾出现了把商人当土豪打，把富农现款捐尽的偏向，为了彻底纠正这种偏向，使财政收入有经常、可靠的来源，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工农民主政府先后建立了税收制度。在分田工作基本完成的地区，开征了土地税。首先开征土地税的是井冈山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以后，赣南和闽西也先后开征了土地税，采用比例税率。一九三〇年《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土地法》采取了累进税率。这是根据地土地税制度的重要改变。它把党提出的累进税原则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成为一九三一年以前中央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于红军的粮食供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建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此以后，中央根据地的财政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面建立了各项税收制度，停止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建立各项财政法规，在中央根据地内实行统一财政。一九三一年底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将向农民征收的土地税改称农业税，根据阶级的不同，按每户每人平均收获稻谷的数量采取不同的累进税率进行征收。对城镇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工业暂未征），按

资本的多少累进征收。从此，中央根据地实行了统一的税收制度。后来，中央根据地还开征了关税（即向进出革命根据地的货物征收的税）和山林税，进一步健全了税收制度，增加了财政收入。在这一时期，税收逐步取代了过去的筹款和捐款，成为中央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始终占居重要地位，这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对革命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由于中央根据地经济基础薄弱，又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和经济封锁，依靠根据地的税收是难以保证需要的。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后，这个矛盾就更加突出了。面对这种情况，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发行六十万元的公债。这一办法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反“围剿”战争的发展，红军日益扩大，根据地财政所面临的困难越来越严重了。为此，从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又先后决定采取多种财政措施，来克服财政所面临的困难：再次发行革命战争公债一百二十万元；修订《暂行税则》，提高农业税和商业税的税率；恢复主力红军在新发展区域的筹款任务；在新发展的城市对三千元资本以上的工商业户实行派款。但这样做的结果，加重了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的负担，使他们力不胜任。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份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象我们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所得

税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① 我们必须重视这一教训。决不能因战争的需要，而不顾工商业的可能，过多提高税率，增加他们的税收负担。否则，势必打击工商业。

一九三三年中央根据地面临着更大的财政困难。一方面，蒋介石积极准备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进一步加紧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另一方面，连年战争使根据地的财力、物力受到极大的损失，广大人民感到负担过重。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中央根据地的财政困难，除了采取必要的财政措施外，应从发展根据地经济上寻找出路。毛泽东同志及时动员大家要努力发展生产。他说：“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② 他批评了那些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可能的思想，指出：“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③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为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事业和充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1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05页。

③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05至106页。

实战争力量，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之用，以三分之一作为军事经费。此后，中央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农业和工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合作社得到了迅速发展，对外贸易有所开展。这些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都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保证根据地的军需民用作出了贡献。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后，军事费用的支出越来越大。而这时，又由于反“围剿”战争的不断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新开辟区域的筹款已很困难，各项税收来源亦大大减少。当时，中央根据地的财政面临着严峻的局面。这时，在财政工作上就不得不增发货币，以应急需；采取多种办法，动员群众力量支援战争。

在解决根据地财政困难的工作中，根据地的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银行通过发行适量货币，支持财政供给革命战争的需要。到一九三四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中央根据地的货币发行总额约达八百万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财政上的应急需要而发行的。由于财政日益困难，向银行透支过多，发行纸币日益增加。结果是币值急剧下降，实质上这是根据地人民的另一种经济负担。对此，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严肃地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战争情况的变化，这个重要原则未能执行。银行的财政发行乃成为根据地人民

对革命的另一种形式的重大贡献。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主席团作出《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证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动员群众克服财政困难，争取战争胜利。除了继续完成公债和征收土地税外，广泛地开展了向群众借谷运动。同时，号召和动员群众进行捐献来支援革命战争。在激烈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的粮食供给成了严重的问题。当时，财政工作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全力收集粮食，除征收农业税外，三次向群众借谷。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春，借谷十六万担；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夏，借谷二十四万担；第三次是一九三四年秋，借谷六十万担。由于群众的大力支援，及时归还第一、二次的借谷也大大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这三次借谷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红军的粮食供给。

号召和动员群众捐献，也是中央根据地克服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方法。根据地的广大人民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他们除了交税、购买公债和借谷以外，还用各种捐献办法支援革命战争。中国店员手艺人工会曾号召该会会员退还各自购买的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这一号召得到了中央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纷纷将该期公债票退还给工农民主政府，作为捐献支援革命战争。此外，在群众中还开展了每人节省三升米运动，用来捐助红军。有的拿出许多物资慰劳红军。江西省苏维埃1932年冬的报告称，根据几个月的不完全统计，江西省苏维埃给红军的慰劳品就有布草鞋71,317双，麻草鞋